

# 川东、北部墓葬碑刻中的龙纹饰与四川丧葬民俗

肖卫东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四川东部和北部地区留存着大量清代墓葬,这些墓葬碑刻艺术作品中龙的形象反映了历史上四川地区的民俗,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双龙题材与四川丧葬民俗的物化表现、回龙顾祖与四川客家移民历史民俗、钻龙与四川百姓的舞龙民俗、鱼化龙的地域民俗特征、草龙与农耕民族的情结等。

**关键词:**墓碑;雕刻艺术;龙纹饰;丧葬;民俗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4-0053-04

四川东部、北部一带至今留存着大量清代墓葬,多数因其精美的碑刻而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墓碑雕刻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其中,罗晓欢从美术学角度对部分作品有过研究,但未涉及民俗。四川北部的南江县、旺苍县处于历史上著名的金牛道之东,其中南江县处于米仓道上,其北达汉中,与褒斜道、傥骆道汇合,是屡次民族大融合北方民族入蜀时选择的路径之一。开江县则位于米仓道与荔枝道之间,一直是备受鄙弃的荒野之地。川东、北部一带是被历代王朝冷落的不毛之地,因天高皇帝远,恰好成为不少北方贵族南下入川的首选避难之处。但他们骨子里对皇恩的向往情结却不时在民俗细节中表露,其中,龙作为古代天子与皇权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川东、北部地区,并且多数都有“旌表”之意,明显地传达出这些墓主对于皇恩宠幸的向往。南江、旺苍、开江等县的部分清代墓葬碑刻作品映射出巴蜀百姓的民俗生活。

自古龙为权威、力量之象征,加之古代帝王以龙种自比,在中华文化中,龙兼具人间的至尊与神界的至圣之意。考古实物证明,至晚在战国时期,就有以龙凤引领死者灵魂升天的信仰习俗。这一习俗世代延续,至今不衰。只是到后代,增加了借助龙凤之神威护佑先祖、保家族兴旺之意。今日巴蜀地区的民间丧葬仪式中,与龙有关的民俗事项仍多如牛毛,且举足轻重,其中,代表性的有龙灯、龙杠、龙脉、望龙等,尤其是龙灯的活动贯穿于丧葬仪式的始终。川东、北部地区的墓葬(包括墓碑与墓室)雕塑中,龙形象的频繁出现除了与皇权有关外,亦与该地区的丧葬民俗密切相关。于寻常百姓而言,龙之神性可亲近而不可求,故四川百姓在墓碑上雕刻姿态各异的龙,以借其力庇护祖先及后代,使家族繁荣昌盛,如四川东部和北部墓碑中常见的“对龙”、回龙顾祖、“钻龙”“鱼化龙”“草龙”等。

## 一、双龙题材与四川丧葬民俗的物化表现

双龙题材的墓葬雕刻与四川丧葬习俗中的龙杠民俗有密切关系,它隐喻着民间祈福驱邪的深

收稿日期:2016-04-10

作者简介:肖卫东(1973-),男,四川宜宾人,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画和民间美术研究。

远意义,二者均可视为巴蜀重要的物化民俗事项。

南江县下两镇帽坝村赵应选墓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月,其墓碑上刻有高浮雕彩绘对龙。该对龙造型舒张,具备古代民间传说中龙的典型特征:牛头、鹿角、虾眼、蛇身、鹰爪、狮尾、鱼鳞。远远望去,二龙四爪开张,腾空飞舞,云雾缠绕于龙体上下,似缠枝藤蔓;近看则为舒卷流畅、极富动感之云气。高浮雕二龙的嘴部一翕一张,龙须遒劲有力,龙髯随风飘举,动态十足。龙眼圆睁,眉宇高扬,呈“品”字形云纹。龙体腹部蛇腹纹样逼真,背部鳞甲以两级浅浮雕表现出龙鳞的结构,龙体后半部翻卷的躯干,更显两云龙凌空飞舞之态。龙爪四趾骨节毕露,强劲有力。左侧龙雕作品中,卷云恰从张开的龙嘴中喷射而出,生动再现了翔龙吐云雾之态。南江县下两镇帽坝村的赵绪墓碑雕刻有“二龙抢宝”(又称“二龙戏珠”)。作品仍以高浮雕刻出,但龙身采用了剔地雕法,正中宝珠光芒四射,似从茫茫海山之中升起,外翻光线实则更似花瓣。此作虽为传统“二龙抢宝”,但整个龙体形态却毫无“抢夺”之意,更具“戏珠”之趣:二龙皆三足立于祥云之上,一前爪捋髯,嘴部微张,全然在凝神静思,欣赏眼前瑰丽夺目的宝珠。雕刻此类双龙之目的在于镇守墓门,使墓主人安然长眠,以示后代子孙对仙逝前辈的爱戴与尊崇之情,其本身是禳灾祈福民俗的物化反映,其成对的构成形式又与四川丧葬习俗中的龙杠有着内在联系。

在四川地区的丧葬出殡过程中,棺材必由大索绑于两根碗口粗大的木材之间,此二木承受整个棺材的重量,为出丧过程中死者灵柩顺利下坑保驾护航,借龙声威,故称龙杠,喻二龙护佑之意。此习俗在山西太原、晋中一带亦有,当地称二龙杠,也叫罩或官罩,需要32人或64人抬扛。四川东部、北部流行在棺材上罩一顶布轿的做法,这与太原等地的习俗有共同之处,只不过四川地区通常由前后各4人抬扛,故百姓戏称八抬大轿,其寓官家大轿之意显而易见。若追溯其渊源,可参证古代官家所乘的八抬大轿,甚至天子出行独享的最大规模的大轿仪仗。在莽荒偏僻的四川东部和北部山区,地方名流流借“皇钦待赠”<sup>①</sup>的名义,享受“真龙天子”的待遇,因无人可以求证,却能显耀门庭,此风逐渐发展成俗。龙具有欢喜腾跃之特性,民间便以颠轿的方式表达这种情感,在丧葬中演变为颠棺。由于棺材自重较大,加之送葬过程中的颠棺等习俗,要求龙杠必须是粗大整木。巴蜀墓碑上的雕刻对龙及二龙戏珠等题材的雕刻,可视为龙杠及其尊龙文化的物化表现。

## 二、回龙顾祖与四川客家移民历史民俗

四川东部和北部的清代墓碑碑帽形式多样,有工字金、状元头等形制。其中,状元头碑帽多数雕刻回龙顾祖题材,南江县侯家乡石寨村夏德玖墓碑碑帽所刻回龙顾祖浅浮雕就是其中一例。该碑帽中,二龙自碑帽顶部,左右穿云而下,至下端匾额侧时,回首上昂,两前足直立云端,另一拂捋颌下长髯须,耳目圆睁,注视碑顶正中“丙山壬向”之浮雕牌位,形成合抱之势,此即回龙顾祖。有趣之处在于,二龙皆伸一后爪紧拽一根龙须,似引领龙首,回望祖宗牌位,更增强“回顾”之动感。下方匾额楷书“佑启后人”,形象再现了四川客家百姓代代相续、念祖护幼之传统习俗。明清时期,四川地区人口迁徙频繁,故回龙顾祖雕刻有其深层历史渊源。四川地区有不少客家聚居点,在这些地方,客家人自称是湖广填川时由广东迁入的,入川之初,“不少人蜀客家先辈在定居四川后,又千里迢迢地返回岭南,背回其祖辈的遗骸,葬于四川新故乡,祖父辈及其孺人的遗骸迁葬在蜀中已定居地,称为‘筋骸入川’”<sup>[1](217)]</sup>。龙泉驿区洛带镇刘氏家族至今尊奉入川七座祖坟,其中就流传着该家族入川创业、返乡背负祖先筋骸进川入葬的说法。同时,刘氏家族入川后一直保留其舞龙习俗,以“豢龙世家”著称,有“上川龙”之誉,更赋予回龙顾祖雕刻深刻的人文情怀与现实意义。四川百姓对祖宗的崇敬延及祖坟等物,视物若人,多数宗族还将此定为条例,写于族谱,以训示后辈<sup>[2](23,37)]</sup>。

回龙顾祖文化思想在龙灯表演中,表现在其必备仪式程序中:龙灯进入孝家,首先朝拜其祖宗

① 四川东、北部清代墓葬碑刻绝大多数都题刻“皇钦待赠”“皇钦待诰”等铭文。大量史料证明,墓主人生前为地方名流,地方政府借其声望维持一方秩序,许诺皇家封赠,但直到死去仍未兑现,故一直处于“待赠”状态。

灵位及死者棺柩,谓之“开四门(东南西北)”;待棺材入坑,覆土之前,龙灯须绕坟坑三圈,谓之“圈坟”;安葬完毕,离孝家之前,亦须朝拜祖宗,谓之“关四门”。其中“开四门”与“关四门”实际就是回龙顾祖的丧葬仪式。而状元头形制和回龙顾祖的造型与江西等地坟墓取合抱之意的圆形构图惊人地相似,我们不妨假设状元头与回龙顾祖是南方入川移民对坟墓造型因地制宜的变通,若假设成立,或可作为研究江西移民入川创业发展史的切入点。

### 三、钻龙与舞龙民俗

龙凤被看作集天下灵气之神物,民间语言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等语句生动地表达了百姓心中龙具有的神秘形象。南江县侯家乡石寨村夏彭氏墓碑顶部所刻“二龙抢宝”、旺苍县化龙乡亭子村新桥社王文学墓碑凳上所刻鱼化龙,均以平地浅浮雕刻出写实的卷云,龙身掩隐于升腾萦绕的云气之中,时隐时现,隐藏部分全然不见,在相隔一段距离之石面上掏出一洞,庞大的龙身钻出洞外。此法栩栩如生地表现出龙、云之藏露,宛若一真龙深藏于石碑中,故当地人赋予其一个形象的美称——钻龙。

龙在百姓心目中是翱翔九天的神,神龙之所以见首不见尾,是因为云雾的遮罩,因此,在四川丧葬习俗的龙灯表演仪式中,除锣鼓喧鸣之外,必有鞭炮相伴,霎时烟雾萦绕,彩龙翻飞,时隐时现,烘托出龙翔九霄的神秘氛围,俨然真龙驾云而至。在表演中,无论烟雾如何浓密,舞动的龙头始终是观众关注的焦点。与钻龙题材刻意表现龙头的技法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都是以写实手法表现真龙形象,其渊源与衍变一脉相承,只不过舞龙仪式为非物质民俗,钻龙为物化民俗。

### 四、鱼化龙的地域民俗特征

鱼化龙的题材是四川东、北部清代墓葬雕刻中反映古人“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代表作品,它表现了淳朴的民风 and 浓重的文化意识,其中有鱼龙分体与鱼龙合体两类。

旺苍县王文学墓碑碑凳上雕刻的钻龙也是鱼化龙题材。石刻表现回首顾盼的钻龙之后,两条在水中摆尾转身、尾随龙行的鲤鱼各具形态:一条鲤鱼躬身瞪眼,似受游过大龙之惊吓,惊魂未定;另一条则被腾龙卷起之巨浪掀翻,毫无惊惧之态,反而翻身张嘴,欲咬住神龙尾翼,似有跟随腾龙升天而去之势。南江县长赤镇乐台村石马坟墓刻中的鱼化龙以圆形镜面构图,腾空的飞龙大部分被云层遮盖,只露出俯瞰之龙头与远去之龙尾,左下方水中,一鲤鱼仰面朝天,与腾龙呼应,口吐两水柱似龙须,暗示将要化身为龙。此外,南江县红光乡青山村五组张公仪墓碑座及南江县侯家乡赵家村一组赵王氏墓碑座等雕刻鱼化龙题材作品,亦属鱼龙分体类代表作。

另一类鱼化龙以鱼龙合体(无龙爪)之形展现,其诞生与演变受多方因素影响<sup>[3]</sup>。南江县红光乡白庙村一组杨谭氏墓坊碑顶所刻双龙,以及南江县红光乡青山村四组张太祥、张王氏合葬墓碑顶部双龙,二者造型雷同,从其鱼龙一体的形态看,属于典型的古代摩羯纹演变的屋顶鸱吻<sup>[4](203~204)</sup>。旺苍县化龙乡亭子村新桥社王家祠堂旁大碑门洞顶部一对鱼龙昂首张嘴相向,怒目而视,头部造型极度夸张,透雕加上流畅的线刻,整件作品生动传神,可谓鱼龙形象的代表之作。

在我国古代,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凡有中科进举之人,不仅个人荣华富贵,且光耀门庭。由于从此可摆脱农业劳作,尽享皇家俸禄,故被戏称为“跳龙(农)门”。此民俗传统在视觉艺术中被演化为“鲤鱼跳龙门”,亦称“龙鱼互换”。鱼乃凡物,龙为神物,鱼化龙意即平凡之物出神入圣,喻平步青云之意。此类题材在墓葬碑刻艺术中也不鲜见,或刻于碑顶笔架,或置于碑底石凳,或两条头大尾小的鱼龙嘴捧净瓶,或龙在天、鱼在水,两相相对。我们在江西婺源县浙源乡及婺源沱川乡考察时发现,民居建筑匾额四周及雀替等部位有大量鱼龙分体的鱼化龙雕刻作品,这是清代鱼化龙题材在民居建筑中运用的实证。此例或可再次佐证四川东部和北部清代移民与江西、安徽等地建筑民俗的历史渊源,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安徽、江西百姓在清代移民入川的路线图。

此外,鱼在民间丧葬习俗中被视为通灵之物,这一民俗信仰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人物御龙》

帛画,早在出土的半坡时期器物中即见大量鱼类形象,此时期尚属万物有灵之自然崇拜阶段,其后,在《搜神记》中有鱼为龙子之记载<sup>[5][6]</sup>,也为鱼龙一体、性通神灵提供了依据,但巴蜀民间却对鱼在不同场合的出现另有解读。若选择坟地打坑挖出鱼,则此地为宝地;若修房造屋打地基挖出鱼,则意指风水已受破坏,不宜建房。而实际上,旱地挖鱼之说至今无人亲见,仅见于民间传说而已。此外,民居建筑的屋脊两端有木质悬鱼,或单或双,亦因其通天地灵气而设。

## 五、草龙与农耕民族的情结

巴蜀大地自古农业发达,以农耕为业的巴蜀民众对赖以生息之一草一木皆饱含深情,并将其描绘于日用器物之上,经长期演变,原本写实之草木花卉形象,逐步抽象为回旋缠绕之特定纹样,其装饰意味愈加明显。此类纹样与龙形结合,即是草龙,多刻于墓碑门檐和衬鼓之上。草龙的产生原本有避皇家忌讳之用意,待其约定俗成之后,则赋予其更多生活寓意。草龙身细多尾且回环,寓意子孙绵延、香火不断,此恐为农耕民族之特色联想。草龙除整体造型具有龙之姿态以外,遍体鲜见民间赋予龙之常规特征,如无鱼鳞、鹰爪、狮尾等,甚至无龙髯,龙角亦以金银花叶片取代。此处,对龙做疾走状,张嘴无牙,下颚异常短促,此与清代龙嘴之“地包天”<sup>[4][213]</sup>特征截然相反,头颈之间亦无龙髯,颈部回首张望。张开的大嘴吐出极具装饰性的藤蔓植物(忍冬),藤蔓线条婉转圆润,流畅生动,缠绕于龙身,藤叶亦被装饰化,龙角、龙爪、龙尾等均被金银花叶片取代,龙尾分出数枝。龙背鳍则以极简手法塑出,蕴含祈求后世子孙平安之意。

无独有偶,该县侯家乡石寨村夏顺音、杨氏墓坊两侧居然有出奇雷同之草龙。开江县宝石乡复兴寺村九组刘良军家胡氏墓碑抱鼓石上方亦刻草龙,不仅龙角、龙爪及龙尾做草叶状,躯干亦为卷草纹样;开江县甘棠镇八角亭村五组墓中部“寿”字纹样两侧各刻草龙一只。巴蜀丘陵山地,草莽丛生,百姓最恐虫蛇侵扰,而龙为百虫之长,可伏百虫。草龙形象似也反映了巴蜀民众借龙之神威战胜虫蛇,使祖先免遭袭扰之祈愿。以草做龙之习俗自清代流传于民间至今,繁衍出了火龙等传统,舞者编草为龙,观者以火(实为烟花爆竹等)袭之,舞毕,将草龙置于河边或江岸焚尽,对此,客家人至今保留。草因其容易生长但有脆弱的特点,在民间被视为最低级生物,其能摇身做龙,实现质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的浪漫主义思维。在语言民俗中,也不乏用草根形容民间自发的团体或组织,以与科班相区别。但在民间艺术这条道路上,草根的生命力往往盛于科班,所以草根艺术登上大雅之堂在今天已经不见,以草成龙的草龙精神也在民间发扬光大。

四川东部和北部清代墓葬中的龙纹饰碑刻题材多样,其民间艺术特色浓郁,他们在展现清代定居此地的百姓的生活理想与美好祈愿的同时,也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时代民族迁徙的辛酸与苦痛。结合部分铭文,我们还能看到关于我国古代民族迁徙的历史记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清代四川地区的移民历史。而这些碑刻中姿态各异的龙所蕴含的对后辈之期许,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成了如今四川的各种民俗,并随着百姓的迁徙而遍布蜀内。墓碑龙纹饰雕刻艺术所彰显的家族地位,对逝者功德的咏颂、对子孙兴旺的祈福,都饱含对后代教育之意义。从如今巴蜀客家移民仍然秉承的耕读传家及“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习俗中,或可管窥巴蜀百姓民俗文化之一斑。

### 参考文献:

- [1] 孙晓芬. 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 [2] 傅氏族谱·家规十四则[Z]. 遂邑大西街漱芳石印局,民国12年代印.
- [3] 岑蕊. 摩羯纹考略[J]. 文物,1983(10).
- [4] 刘志雄,杨静荣. 龙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5] (晋)干宝. 搜神记[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海晓红】